



教育部颁发的“省属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内刊之一

建议活页

1996.6—2006.9

(选本)

深圳大学特区台港澳经济研究所

“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

章必功

2006.6.18

(此为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教授为本刊十年选本的题辞)



三个版本的合订本

建议活页

(1996.5—2003.11)

建议

建议

建议

建议

建议

建议

建议

建议

说明：深圳大学
所唯一的一个综合性大学
深圳大学科技园
之一。为了更广泛
地宣传《建议》
定期出版，其
重要意义。

说明：在
深圳大学科技园
内，深圳大学科技园
是唯一的一个综合性大学
深圳大学科技园
之一。为了更广泛
地宣传《建议》
定期出版，其
重要意义。

说明：深圳大学
科技园是一个综合性大学
深圳大学科技园
之一。为了更广泛
地宣传《建议》
定期出版，其
重要意义。

说明：深圳大学
科技园是一个综合性大学
深圳大学科技园
之一。为了更广泛
地宣传《建议》
定期出版，其
重要意义。

说明：深圳大学科技园
是一个综合性大学
深圳大学科技园
之一。为了更广泛
地宣传《建议》
定期出版，其
重要意义。

霜信报黄花

(按语)

悠悠十年，水天一色。由我提议创办的，由时任校长蔡德麟教授批准的《建议活页》已经成为一个闻名遐迩、风姿绰约的“小名人”了。真叫人由衷地体验出：“事情总是人干出来的”这样一个不大不小的道理来。

想当初，为了承担研究所评判现实焦点，仅供领导决策参考的学术责任，决定搞一个不同于“报告”、“咨询”一类的小东西来。又受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华书局出版那套《活页文选》的启示，我把它命名为《建议活页》。

其方针是：**三言两语、理论色彩、一家之言、内部争鸣**。真可谓基本路线“十年不动摇”。

近八年来，它又得到了时任党委书记姜忠、校长谢维信的认真培育。

十年后的今天，党委书记江潭瑜就任之初就希望我们“**大胆探索**”，把这一具有鲜明特色的东西“**办得更好**”。

章必功校长则精选语录来深情寄语：“**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

我们倒是没有这个能力与野心，只不过想表达一点对社会有益的声音而已
这里挑选几篇能公开发表的小东西，以示录念。

苏东斌

2006. 9. 10

目 录

1 应准确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的本质(2006年9月)	010
2 慎用“经典文艺”(2006年9月)	012
3 研究社会转型, 请关注一下当年的蒋经国(2006年7月)	013
4 现实新农村目标需要谋求体制变革(2006年7月)	015
5 这样表述好(2006年6月)	017
6 规则的公平要从公平的规则开始(2006年6月)	018
7 中国缺失真正意义上的工会组织(2006年5月)	020
8 高等教育要转变增长方式(2006年5月)	022
9 深圳应生产自己的《深圳农民工调研报告》(2006年5月)	024
10 建议将产业创新作为第一发展战略(2006年4月)	026
11 改革应跳出改革者的利益樊篱(2006年4月)	028
12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和谐社会吗?(2006年4月)	030
13 建设循环经济要从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开始(2006年4月)	031
14 建议将“先进文化”改为“优秀文化”(2006年3月)	032
15 自主创新要“热中有冷”(2006年3月)	034
16 “实践”不等于“经验”(2006年3月)	036
17 “增长”不等于“发展”(2006年1月)	037
18 “稳定”不是“和谐”的同义词(2006年1月)	039
19 还是要争论一番(2006年1月)	041

20	少些行动,多些制度安排(2005年12月)	043
21	中国经济特区的生命力(2006年12月)	045
22	关于在深圳设立“廉政公署”的建议(2005年11月)	047
23	必须正确对待澳门的博彩事业(2005年10月)	048
24	必须全面、正确地评估人民币升值对深圳的影响(2005年10月)	051
25	还是很艰难(2005年10月)	053
26	对“区域性金融中心”提法的质疑(2005年7月)	055
27	一件小事(2005年7月)	057
28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不是学雷锋做好事(2005年5月)	058
29	党员不能评“星级”(2005年5月)	060
30	既然要构建法治社会,也就没有必要再划分什么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2005年5月)	062
31	科学发展观不应该脱离“科学政绩观”(2005年4月)	064
32	此招不可取(2005年4月)	066
33	和谐深圳首先应是安全深圳(2005年4月)	067
34	关键在于落实(2005年4月)	068
35	把改革、开放与创新的旗子更高地举起来(2005年4月)	071
36	“特”,不能单纯理解为独辟蹊径(2005年4月)	073
37	能否再加几句“概念”的前提(2005年3月)	074
38	不要滥用“和谐”(2005年3月)	076
39	“善政”还需“仁政”(2005年3月)	078

40	一点建议 (2005年3月)	079
41	建议修改三处文字表述 (2005年3月)	081
42	请注意三个倾向性问题 (2005年1月)	084
43	“整顿党的作风” (2004年12月)	086
44	关注深港两地金融开放和金融监管中的新问题 (2004年12月)	087
45	在加强自身执政能力建设上,还必须关注“法治”与“民主” 两个问题 (2004年10月)	088
46	用科学发展观为特区发展定位 (2004年10月)	089
47	执政能力主要体现在“公仆”的意识与“公仆”的行为上 (2004年10月)	093
48	“创新”背后的“陈旧” (2004年10月)	095
49	“净畅宁”的理论意义 (2004年8月)	097
50	还是应当让“市场”来说话 (2004年10月)	098
51	一个值得认真领会的政策主张 (2004年7月)	099
52	“文化立市”的实质是“文明立市” (2004年6月)	100
53	要实施“9+2”,必须关注两个问题 (2004年6月)	102
54	紧抓育才、聚才、用才三个环节实现“以人为本” 战略思路 (2004年3月)	103
55	解放思想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提条件 (2004年3月)	105
56	让一切人力资本都荡漾起来 (2004年2月)	107
57	深圳如何创建国际化会展中心 (2004年1月)	110
58	珠三角何为“大”? 何为“泛”? (2003年12月)	112
59	名牌教育的大跃进真的来了吗? (2003年12月)	114

60	深圳创建区域性金融中心必须明确区域 定位和城市功能定位 (2003年12月)	117
61	深圳要在建造金融业航母上创新路 (2003年11月)	118
62	从根本上消除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2003年10月)	119
63	关于建设“文化大省”的个人意见 (2003年9月)	120
64	这难道是在鼓吹“先进文化”吗? (2003年5月)	121
65	坚持“实事求是”才是正确的“舆论导向” (2003年4月)	123
66	对于提案的答复的建议——建议以承办单位的 “最终报告”来取代现行的“表态式”承诺 (2003年3月)	125
67	关于在深圳多办几所大学的建议 (2003年3月)	126
68	各地不必纷纷制定“时间表” (2003年2月)	127
69	追求效率就是追求公平 (2002年12月)	128
70	是一个小缺点 (2002年9月)	129
71	先革命,再改革 (2002年8月)	130
72	关于“深圳精神”的三点看法 (2002年5月)	131
73	对《深圳市产业结构调整方案》的八点建议 (蓝版) (2002年4月)	133
74	冲破“人身依附”、确认“人才流动” (2002年3月)	135
75	制度决定作风 制度创造作风 (2001年10月)	136
76	尽快从“学历社会”向“资格社会”转型 (2001年9月)	138
77	一个“大理论” (2001年6月)	139
78	对流行的两个评价中国社会科学	

不正确标准的批评 (2001年5月)	140
79 请高度关注吸引人才的弱化趋势 (2001年4月)	141
80 建议将“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修改为“ 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 (2001年4月)	142
81 建议充分加强深圳的科技创新的“基础建设” (2001年3月)	143
82 “体制创新”的方向就是走向国际惯例 (2001年1月)	144
83 建议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重印时增补 两篇重要的大文章 (2000年10月)	146
84 关于特区发展的两个理论问题 (2000年9月)	147
85 经济特区的创办不应忘记另外两个人 (2000年6月)	149
86 激光是光子产业的核心技术 (2000年4月)	150
87 一个小政府, 值得大体会 (2000年1月)	151
88 深圳自己不宜提“示范市”字样 (2000年1月)	152
89 在什么意义上我们能够说: “2005年深圳将基本实现现代化”? (1999年9月)	153
90 扩大需求尤其应关注“改革因素” (1999年3月)	154
91 专家管理与功能发挥 (1999年1月)	158
92 “三级授权经营制”仅仅是体制转型期的过渡形式, 而非目标模式 (1998年12月)	162
93 光子技术与信息产业 (1998年12月)	164
94 可值借鉴的重要经验 (1998年9月)	167
95 关于我国当有效需求不足的政策建议 (1998年6月)	171

96	充分发挥粤深的“借鉴优势”， 尽量吸收香港的“体制资源”（1998年6月）	175
97	请重视一下“光子产业”（1998年6月）	178
98	要重视市内“村民”的现代城市文明教育（1998年4月）	180
99	科教兴市：请借鉴香港对高等教育的投入（1998年4月）	182
100	“企业兼并”须慢行（1998年1月）	184
101	捐款扶贫总不是办法（1997年9月）	188
102	是“高科技产业”还是“高科技密集型产业”？（1997年4月）	191
103	关于建立光子学和光子技术重点实验室的建议（1996年12月）	193
104	关于深圳大学定位与发展的建议（1996年10月）	196
105	关于政府职能转变的新思路（1996年6月）	198
106	不能笼统地使用“深港衔接”一词（1996年6月）	200
107	这两个提法欠妥当（1996年5月）	202
附：“最是橙黄桔绿时”——深圳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巡礼		

应准确地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

一、不应片面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文字表述。

在学习、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有一种倾向必须克服，即从文字表述中片面地理解它的本质涵义。

因为“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是仅指代表高新技术这一趋势。先进生产力的布局总是极少数，大多数是适用技术、一般技术，还有少数是落后技术。就中国而言，广大农村还谈不上拥有大规模的先进生产力，但是中国共产党也是广大农村生产力的当然代表；“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能理解为文化本身还分什么先进与落后，如《诗经》、《宋词》、《红楼梦》等是先进文化呢，还是落后文化呢？《桃花扇》与《千万不要忘记》到底谁比谁更先进呢？！文化只有优劣、雅俗之分，中国共产党当然要提倡优良文化；而“代表最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既不能理解为只代表一个整体的利益，更不能理解这个利益没有当前的内容。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当然要代表每一个中国人的利益，而且必须包括这个人的眼前的、具体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宗旨不允许以一个抽象的整体利益，加上一个抽象的未来利益来牺牲每一个人的当前利益。这就是说，既不能以当前利益来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也不能以子孙后代的幸福来否定每个人的现实利益。同时，“最广大人民”实际也是指全体中国人民，而不再是指要团结95%以上的群众，不断地去打击5%左右的阶段敌人。执政党的理念不是不断地去分清敌我友，而是使社会各阶级，各阶层都能和睦相处，化解矛盾尽量做到平安无事。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社会和谐。

如果把增强中国人的利益作为中国共产党行动的基本归宿，那么种种“先进”表述都在于推动着社会进步与社会和谐。

我们完全可以从1921年建党时的纲领、从1945年“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以及从1949年的“七届



二中全会”报告中寻找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文字表述的基本主张。但是，**我们应当清醒看到这一思想正式提出后中央所做出的巨大的政策调整与制度变迁。**我以为，这才是它的精彩之处，独特之地。比如当“党章”中接受优秀私人企业主入党时，党的基础就不再是“无产阶级”了；当“宪法”中提出保护私有财产、保护非劳动合法收入时、党的现实目标就不再是“消灭私有制”了。而这一点，马克思没做到（不需要也不可能）、毛泽东没做到（不需要也不可能），甚至连邓小平也没做到（不需要也不可能）。

只有当我们在承认“与时俱进”的方法论时，才能找到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在逻辑上与价值上的统一。也只有这样，而不是相反，才能为真正推动社会进步和社会和谐而奠定制度上而不是道德上的，体制上而不是教育上的坚实保障。



慎用“经典文艺”

显然，诸如《红楼梦》、《罗米欧与朱丽叶》等古今中外名著已经被公认为“经典文艺”了。但对于中国特殊年代产生的东西，尽管在某些内容与形式上“好看”、“好听”，如《沙家浜》中的“斗智”一切等，却不能称之为“经典”。因为，从总体上讲，不仅在内容主线上不遵守逻辑，即《红灯记》中“找密码事件”，而且在形式上都有些“高大全”之类的灵魂，失去了艺术真实的生命基础。鲁迅曾明确地讲：“红楼梦”经典价值就在于“敢于如实描写，并无伪饰”。我认为，所谓“样板戏”的美学失败就在于它玷污了普通人的崇高性，纯洁的火焰同时燃烧掉真正的英雄主义与浪漫情怀。否认了这一点，也就在事实上肯定了给中国人民、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灾难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内容——“文艺革命”；也就在事实上肯定了作为时任旗手的江青的基本作为；也就更加肯定了毛泽东最初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与及时。

所以，“八个样板戏”并不是什么“经典”，《欧阳海之歌》也不是什么“经典”，《艳阳天》也不是什么“经典”。对此，我的观点是：**局部可欣赏，总体须否定！**

在中共中央正式批判“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某些地区的主管人士再竭力赞赏，力主重排、复映“红色经典”之类的东西，并不是一个好趋势。难怪巴金晚年一听到“要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曲调时就常作恶梦。



研究社会转型，请关注一下当年的蒋经国

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说他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后可以实行普选”。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4月访美期间再一次向世界重申：保障人民的宪法权利、民主选举……。

为了开启中国民主政治的新进程。有一个历史人物的作为值得参考，他便是蒋经国。

本来，蒋经国与他父亲蒋介石一样，曾残酷地镇压民主运动，实行特务政治。但是到了晚年，在世界大潮推动下，却能够力排众议，与时俱进。1986年，他有3个目标要李焕（中央党部秘书长）替他达成。

第一，国民党需要彻底改造才能在完全公开的政治制度里竞争。

他说：“如果我们不重振国民党活力，人民会抛弃党……甚至党员都会流失。”

第二，推动“全面政治民主”，也就是取消“戒严”、允许民众自由组党、“国会”全面改选、解除“报禁”。

第三，“两岸统一”。

这是他最明确、最强烈的一点，显示他见到在可预见的未来，甚至在他阖目之前的有限时间内，有必要、也有机会获致名义上的统一。他说：“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踏上统一之路。台湾和大陆终究必须统一。两岸若不统一，台湾恐怕将越来越难独立存在。”

我想，正是这一举动才引来了邓小平传话要派杨尚昆与李焕直接谈判。

当然，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敏感的东西。但对于中国来讲，既有人民强烈支持，又有军队警察的可靠保障，可以说帝国主义侵略不了，反攻大陆也只能是死路一条，从内部讲，任何叛乱都将被镇压。可见，邓小平的预言，胡锦涛政策都是十分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所以，建议从上至下做一个稳妥安排，在党中央领导下，积极而有步骤的进行社会的全面转型，



在胡锦涛时代，以求早日完成由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在我看来，中央完全有这个能力。

（又及：毛泽东多次讲过，他与蒋介石有两个共同点：第一是中国的统一；第二是民族的独立。）



现实新农村目标需要谋求体制变革

袁易明

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著名的舒尔茨就得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普遍性结论，即传统农业虽然贫穷但有效率。在传统农业令人惊讶的理性面前，推进农业发展的选择不外乎有三个：

第一，变革农村经济运行体制。通过新体制创造农村新的生产力，80年代初期的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以生产队为农业产业组织方式的集体经济的否定，创造出了巨大的发展动力，带来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农村经济相对于城市的优先发展，农村经济的五年黄金增长期带来农村社会发展的一日千里。这就是体制的魅力。

第二，引入现代技术，促进技术进步。通过技术要素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跃升。但是，世界的历史和我国过去的历程都表明，在传统农业中引进技术存在着众多的无形障碍，从绝大多数传统农民都处于生存的水平线上看，传统农民的行为目标不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是生存机会的最大化和风险的最小化，传统农民的财富水平，极小的生产规模使得他们在哪怕是一点风险的面前都会望而却步，更不用言采用风险往往较大的新技术，由此，技术路径的适用前提是极大地降低技术的风险水平或者拥有财富基础的农业。

第三，外在条件的大幅度改善。通过大规模、广范围、长时间的财政投入，开展以交通、通讯、教育、医疗卫生等为主要内容的公共设施的建造和以农田、水利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生产设施的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条件，这些条件将为农村经济减低运行成本，为农业发展提供客观条件，但这仅仅是一些外在条件，仅依靠这样一些外在条件的建设显然无法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终极目标。

立足于国情，实现新农村建设的最终目标需要依赖体制变革。虽然中国的新农村建设要求政府必须先行——难以想象在饮水困难、电、路不通、通信落后，严重缺乏教育基础等



条件的地区建设起新农村来，但这只是第一步，**只有当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时，真正意义上的新农村建设目标才有希望。**在未来，政府还能向农业“让利”的空间已相当有限，新农村建设的一条根本出路在于寻求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当在一新的农村经济体制下，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形成的资源分割，规模效率低下的现状得到改变，农业生产要素在更大的空间上流动重组，农村由分散、游离的家庭经济向规模化、产业化、现代化迈进时，“吃菜地里摘，吃蛋自家鸡窝里拿”的景象才会彻底改变，才可以宣告新农村建设的伟大胜利。

（作者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
资源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